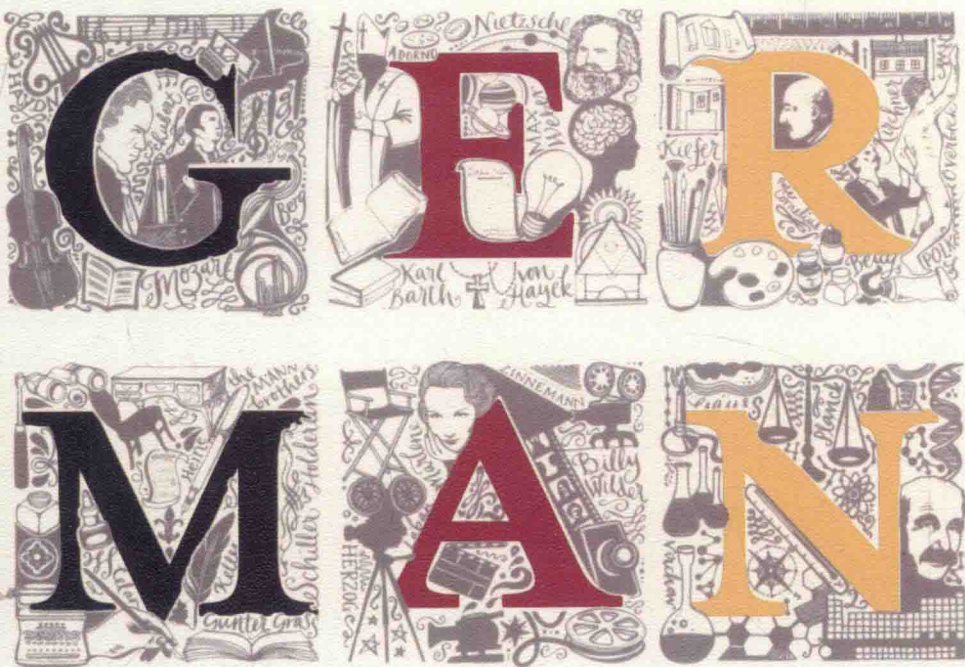




THE GERMAN GENIUS

德国天才

2

受教育中间阶层的崛起

〔英〕彼得·沃森 / 著 王志华 / 译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THE GERMAN GENIUS

德国天才

近现代德意志的思想、科技和文化

2

受教育中间阶层的崛起

〔英〕彼得·沃森 / 著

王志华 /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6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国天才.2,受教育中间阶层的崛起/(英)沃森著;
王志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2016.11 重印)
ISBN 978-7-100-12241-2

I. ①德… II. ①沃… ②王… III. ①思想史—
研究—德国—近现代 IV. ①B51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04885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德 国 天 才

2

受教育中间阶层的崛起

〔英〕彼得·沃森 著
王志华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 京 冠 中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978-7-100-12241-2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6 年 11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印张 17 1/4

定价:42.00 元

Peter Watson
THE GERMAN GENIUS
Europe's Third Renaissance,
the Second Scientific Revolution,
and the Twentieth Century
Copyright ©2010 by Peter Watson
据哈珀柯林斯出版社 2010 年版译出

目 录

第三编 受教育中间阶层的崛起： 现代繁荣的发动机和工程师

第十章 洪堡的礼物：研究的创始和普鲁士（新教）知识 概念.....	3
第十一章 异化的演变	25
第十二章 德国历史主义：“观念史中的一个独特事件”.....	59
第十三章 生物学的英雄时代	77
第十四章 走出“德意志落后的悲惨境地”.....	103
第十五章 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德国热”	141
第十六章 瓦格纳的另一个指环：费尔巴哈、叔本华和 尼采.....	169
第十七章 物理为王：亥姆霍兹、克劳修斯、玻尔兹曼 和黎曼.....	193
第十八章 实验室的兴起：西门子、霍夫曼、拜耳和蔡司	213
第十九章 金属的主宰者：克虏伯、本茨、狄塞尔和拉特瑙 ...	235
第二十章 疾病的动力：菲尔绍、科赫、孟德尔和弗洛伊德 ...	257

第三编 受教育中间阶层的崛起： 现代繁荣的发动机和工程师

|第十章|

洪堡的礼物：
研究的创始和普鲁士(新教)知识概念

“从 1790 年到 1840 年之间的五十年是现代学术演进关键的 225 成形年代。到了 1840 年,自然和物理科学、历史学和语言学在确定了学科边界的同时,生成了主宰 20 世纪学术研究的核心问题。”这一段话出自 R. 史蒂文·特纳 1972 年在普林斯顿撰写的博士论文《普鲁士大学和研究律令(1806—1848)》,他接着说道,“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学者都促成了这个知识组织化的英雄时代,但其中,德意志学者起了决定性的作用。”^①

19 世纪上半叶,意识形态发生着变化,以至于到了 1850 年,德意志的大学几乎完全转化成研究机构,“以适应知识在许多深奥领域的扩张”。^② 这一“研究律令”,按特纳的说法,包含了四项创新:其一,在原创研究的基础上出版新的成果不仅成为一个教授的责任,而且成为他获得一个哪怕并不重要的大学教职的必要条件;其二,为了支持研究,大学开始兴建图书馆、学院和实验室等基础

^① R. 史蒂文·特纳(R. Steven Turner):《普鲁士大学和研究律令(1806—1848)》(*The Prussian Universities and the Research Imperative*),普林斯顿(新泽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2 年,第 1 页。

^② 同上书,第 3 页。

226 设施;其三,教学重新定位,尝试向学生介绍研究方法;其四,普鲁士教授认同一种大学意识形态,即赞美原创研究。正是在 19 世纪早期的德意志大学中,“探索的体制化”第一次融入了教学。^① 1860 年后,这一意识形态被传播到了英国和美国。

一定程度上,如上所述,大学是这一发展最后光顾的地区。其他的机构诸如科学院,往往能快速地回应新知识潮流(比如在英国)。如第一章所讨论的,18 世纪大学的存在是为了“保存和传播”知识。但是,19 世纪的教授认为,他们有责任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这一新思维出现在费希特、谢林和施莱尔马赫的一系列论文中,它们的出版恰逢洪堡推动改革的时期。正如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保尔森(Friedrich Paulsen)写道:“无论是谁,一旦开始追求以学术为业,他就不能满足于学习现存的知识,他还应该有能力从他自己的独立研究中创造新的知识。”^②

现代的教授同时属于两个共同体:他任教的学院和他的学科同僚们。第一个学科共同体,按照特纳的说法可以追溯到黑尔姆施塔特的教授约翰·弗里德里希·普法夫(Johann Friedrich Pfaff, 1765—1825)和莱比锡的卡尔·弗里德里希·兴登堡(Carl Friedrich Hindenburg, 1741—1808)。他们创立了德国第一份专业数学杂志《纯数学和应用数学档案》(*Archiv der reinen und angewandten Mathematik*)。在化学领域,卡尔·胡夫鲍尔(Karl Hufbauer)将黑尔姆施塔特的洛伦茨·克雷尔(Lorenz Crell,

① R. 史蒂文·特纳:《普鲁士大学和研究律令(1806—1848)》,第 4 页。

② 同上书,第 8 页。

1744—1816)和他的《化学期刊》(*Chemisches Journal*)认定为新形成的化学共同体的中心。在这些领域中,正如第一章提到的古典语文学家一样,一个核心集团正在形成中。^①

这些具有自觉意识的共同体的重要意义在于,他们开始获得权威。在18世纪,权威受到限制,国家垄断了教育,可以不与教学人员和学科商议就任免教授。^②(哥廷根是一个例外,这也成就了该大学的卓越。)尽管有鼓励教授出版(研究成果)的尝试,但针对的不是原创研究著作:要求的是教科书,而不是专业著作。

在1790年前,我们关于研究的现代观念还没有形成,学院语
言可以证实这一点,人们会说起学术中的“探索”(Entdeckungen)
和“修正”(Verbesserungen),而不使用“科学研究”(Forschung)一
词。人们假定,“探索”只能由高智力的人士承担,他们拥有强大的
思维能力,可以注意到事物间从不为人所知的关联,可以将大量的
知识体系化,最后得出高度普遍化的结论。换句话说,这是天才的
专利。此外,人们认为,大多数的学术领域本质上是静止的。这些
人中就有约翰·大卫·米夏埃利斯,他相信,在一些学科中,将不再
可能出现新的真理,它们是:哲学、法学、神学和史学的大部分。^③

① 约翰·弗里德里希·威廉·科赫(Johann Friedrich Wilhelm Koch)编:《普鲁士大学:关于机构制度和管理条例集》(*Die preussischen Universitäten: Eine Sammlung der Verordnungen, welche die Verfassung und Verwaltung dieser Anstalten betreffen*),共两卷,柏林,1839—1840年,第2卷,第531—532页。

② 同上书,第181页。

③ 威廉·克拉克(William Clark):《象牙塔的变迁:学术卡里斯玛与研究性大学的起源》(*Academic Charisma and the Origins of the Research University*),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11页。

没有拿破仑和他强加于普鲁士的惨败,可能什么都不会发生。(托马斯·尼佩代在他权威的 19 世纪德意志史的开篇写道:一开始是拿破仑。)之后,改革者掌握了权力。他们认为,国家的崩溃源自弗里德里希二世兵营国家“腐朽的内核”,及其对“机械服从和铁的纪律”的强调。现在,他们呼吁道德的重建,这包括了教育体系的重建。

重建在三条战线上同时实施:组织、行政和意识形态。^① 相对陈旧无能的机构被废除,其他的被合并。最振奋人心的是,新式大学在柏林和波恩创建。

改革开始于柯尼斯堡,面对拿破仑的侵略,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把宫廷搬到了那里,大学里的爱国主义思潮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启动改革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弗里德里希·威廉拒绝了哈勒大学教授代表团要求将该大学整体搬迁至柏林的请求,然而他同意在首都创立一所全新的大学。在此期间,费希特、施莱尔马赫和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沃尔夫都移居至柏林。在那儿,国王的决定引发了关于大学建设理论的大讨论。然而决定性的一步由倾向于改革的首相哈登贝格迈出。他把威廉·洪堡从在罗马的外交闲差任中调回,并任命他为新设立的宗教教育事务部门的大臣。因为洪堡撰写过语文学的文章,所以他和沃尔夫的亲近程度超过任何人。两人携手为新成立的大学招揽学

228 者。1810 年冬季学期,大学开课,费希特(被选举)为第一任校长。

① R. 史蒂文·特纳:《普鲁士大学和研究律令 1806—1848 年》,第 223 页。

从此开启了 19 世纪德国“对教化虔诚追求”(尼佩代语)的时代。^①

洪堡招揽到了大量卓越的学者:法学家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Friedrich Karl von Savigny, 1779—1861),解剖学家卡尔·阿斯蒙德·鲁道菲(Karl Asmund Rudolphi, 1771—1832),加上施莱尔马赫和沃尔夫,当然还有约翰·克里斯蒂安·赖尔(Johann Christian Reil, 1759—1813)和约翰·戈特洛布·伯恩斯坦(Johann Gottlob Bernstein, 1747—1835)。他还从柏林科学院引进了许多科学家。一开始,哲学和法学是新大学最强的学科,在这两个领域,柏林很快就超过了哥廷根。然而事实上,直到 19 世纪 20 年代,该校的自然科学才开始变得出类拔萃。是时,第二所新式大学在波恩创立,卡斯帕·弗里德里希·冯·舒克曼(Kaspar Friedrich von Schuckmann, 1755—1834)接替了洪堡在柏林的职位。^②

如特纳所言,比大学的机构组织改革更重要的是理论的创新,是精神上和哲学上的重新焕发青春。共同的原则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学术意识形态(Wissenschaftsideologie)。柏林大学创建后,这个概念得到了空前成功的实践。它成为了 19 世纪德意志大学的官方意识形态,人们不但赋予它一种令人敬畏的、几乎是宗教的地位,而且还将它定义为德意志大学的“思想”,它强调科研和教

① R. 史蒂文·特纳:《普鲁士大学和研究律令 1806—1848 年》,第 229 页。

② R. 克普克(R. Köpke):《纪念约翰·舒尔策博士》(Zum Andenken an Dr John Schulze),载于《高中期刊》(Zeitschrift für das Gymnasialwesen),第 23 期(1869 年),第 245—256 页。

学的统一。^①

除了洪堡，还有五个人参与了学术意识形态 (Wissenschaftsideologie) 根基的塑造。其中，费希特最为著名，《论学者的使命》(*On the Vocation of the Scholar*) 收入了他的一系列演讲，以及 1794—1807 年在耶拿和柏林期间撰写的小册子。此外，谢林、亨里克·斯特芬斯 (Henrik Steffens, 1773—1845)、施莱尔马赫和沃尔夫也都贡献了自己的思想。在他们的努力下，两个知识传统在学术意识形态中交汇。^② 一方面，新的传统很大部分源自唯心主义哲学，它当时的中心在耶拿。紧跟洛伦茨·奥肯和谢林，斯特芬斯成为自然哲学的主要代表，这也被称为唯心主义的自然科学分支 (在本书第 8 章关于浪漫主义的部分有提及)。另一方面，学术意识形态根植于哥廷根大学的学院新人文主义传统。沃尔夫和洪堡都曾师从克里斯蒂安·戈特洛布·海涅，而语文学家施莱尔马赫通过编辑柏拉图的著作而出名。“他们认定，希腊和罗马的荣耀可以加强德意志学生对于道德和美学的感觉能力。因此，学生应该在专业课程之前修习这些课程，不但在高中，而且在大学。新人文主义者相信，一旦学生能够深入地阅读经典，他们不但能够远离 18 世纪大学的粗俗的功利主义，而且还可以摆脱堕落的生活。”^③

事实上，学术意识形态的支持者主张，中小学和大学是有重大

① R. 史蒂文·特纳：《普鲁士大学和研究律令 (1806—1848)》，第 247—248 页。

② 威廉·克拉克：《学术卡里斯玛与研究性大学的起源》，第 218 页。提及学识和研究的区别。

③ R. 史蒂文·特纳：《普鲁士大学和研究律令 (1806—1848)》，第 252 页。

区别的。在中小学中,学生的任务是获取知识,而大学生应当学习独立判断的能力。尤其是施莱尔马赫,他要求将大学建设成为连接中小学和科学机构之间的桥梁,“适合‘德意志的天才’……大学应该启动一个进程,……完全是一个全新的知识生命进程,以启发年轻人的学术思想……从而养成习惯,以学术的观点看待一切事物”。^① 施莱尔马赫和其他人认为,大学不只是高等的中小学。他们发明了一个概念:面包学业(*Brotstudium*),它只能提供学生一份工作所需要的足够知识,却并不能促进学术知识的积累。

这一切表明,人们在学术意识形态中,发展出了一种对于何为教育的新认识。康德主义和后康德主义的哲学体系认定两种存在形式:现实和理想。对谢林来说,学术是“存在于绝对现实和绝对理想之间统一的知识”。学术是一种哲学上的见解,它认为,现实和理想是统一的。学术思想是人类天生所具有的,但同时也在逐渐成熟,在动态发展。因此,其核心是从唯心主义哲学中推导出来的教化(*Bildung*)理念,即,教育意义上的变化进程。在这个体系中,探索和科学研究也成了一种道德行为。^②

这个看法和费希特的论断颇为接近,即学者和教授是天然的领导者和人类的教师。“学者应该是这个时代最有道德的人;他应

① 康拉德·瓦伦特拉普(Conrad Varrentrapp):《约翰·舒尔策和他那个时代的普鲁士高等教育》(*Johannes Schulze und das höhere preussische Unterrichtswesen in seiner Zeit*),莱比锡,1889年,第447—448页。

② 马克西米连·伦茨(Maximilian Lenz):《柏林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的历史》(*Die Geschichte der königlichen Friedrich-Wilhelms-Universität zu Berlin*),共4册,哈勒,1910—1919年,第2册,第470—472页。

该表现自己最高程度的道德文化。”^①有人怀疑，新人文主义者都是颠覆性的无神论者。但奇怪的是，这些学者又被视为浪漫主义的代表。到了1817年，柏林取代了耶拿，成为新式大学意识形态的中心。

230 但是通常来说，新式大学的创立恰逢普鲁士和其余德意志国家的爱国主义的复兴。由于大学生在自由战争中的贡献使人们转变了观念，大学变得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为流行。^②

从普鲁士和欧洲其他地区开始享有一定程度的政治稳定的1818年，一直到革命爆发的1848年，追求科学和学术研究成为德意志大学的核心特点。“学术意识形态赞美大学里的探索和创造。……它假定，通过对明确定义的研究方法的缜密应用可以获得学术知识，这还意味着，多数大学生都能掌握这些探索方法。”^③这就是普鲁士的学习新理念。

对人们来说，重要的是区分这种新理念是什么，不是什么。在德意志，其开始于康德式的批判，与其同等重要的还有：对古典语文学、历史学和印欧语言的研究（在第8章提及）。在知识领域，这些学科的创新程度不亚于法国科学家拉瓦锡（Antoine Laurent de Lavoisier, 1743—1794）、拉普拉斯（Pierre-Simon Laplace, 1749—1827）和乔治·居维叶（George Cuvier, 1769—1832）几乎同时取得成功的自然科学。比起法国，当时德意志的自然科学还不具世

① 威廉·克拉克：《学术卡里斯玛和研究性大学的起源》，第237页。

② R. 史蒂文·特纳：《普鲁士大学和研究律令（1806—1848）》，第270页。

③ 同上书，第279页。